

“爱·紫江” 公益慈善动态参考

2020年7月-第2期

- 一、研究前沿
- 二、行业动态
- 三、紫江之声
- 四、紫江大事记

目录

一、研究前沿 PAGE1

- 1.台湾大学生海外服务学习经验与全球视野收获 P1
- 2.为本地服务而留学：建立留学与大学后志愿服务之间的联系 P1
- 3.服务学习让美国学生参与有文化意识的内容创作和交互技术设计 P2
- 4.政治效能感、社会资本对大学生志愿服务的影响 P3
- 5.新公共管理理论视角下的日本私立大学社会服务的特征及借鉴 P3
- 6.从承认到认同:高校社会实践育人体系创新研究 P4

二、行业动态 PAGE5

- 1.UP主发力，B站怎么带动年轻人做公益？ P5
- 2.项目招募：助力公益慈善学历教育，“敦和·菡萏行动”二期招募启动！ P5
- 3.推动劳动育人，华东师大夏书院成立公益实践基地 P6
- 4.友成基金会秘书长零慧:普及艺术教育,让乡村孩子美起来 P6
- 5.上海宋庆龄基金会携手芬林集团和SAFE KIDS守护儿童健康 P7

三、紫江之声 PAGE8

- 1.黄晨熹：切实提高家庭应对公共卫生事件风险的能力 P8
- 2.周俊：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多元化的制度成因分析 P10

四、紫江大事记 PAGE12

研究前沿

01 PART ONE 国外期刊

1.台湾大学生海外服务学习经验与全球视野收获

作者：Yu-Heng Chang、Ruo-Lan Liu、Yu-Chi Li
期刊：Journal of College Student Development
出版时间：2020.05
原文：Overseas Service-Learning Experiences and Global Perspective Gains for College Students in Taiwan

本研究以157名台湾大学生为研究对象，采用海外服务学习体验量表及全球视野量表，探讨海外服务学习体验与全球视野变化的关系。分析了2015年暑期参加海外服务的学生的成绩。研究结果表明，他们的全球视野在他们的参与后得到了显著的改善。不同的准备、服务、反思和庆祝经历对全球视角变化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海外服务学习经验的结构方程模型与全球视角的变化具有良好的拟合优度。

2.为本地服务而留学：建立留学与大学后志愿服务之间的联系

作者：Mitic, Radomir Ray
期刊：RESEARCH IN HIGHER EDUCATION
出版时间：2020.06
原文：Global Learning for Local Serving: Establishing the Links Between Study Abroad and Post-college Volunteering

本研究为大学生出国留学和大学后志愿服务的相关因素提供了新的证据。本研究以2002-2012年的教育纵向研究资料为基础，分析了学生的归因特征、学业成就、大学环境和留学参与与学生毕业后志愿服务的可能性之间的关系。本研究以人力资本和地位成就理论为基础，运用ASTIN的投入-环境-结果框架，将留学隔离为与大学后志愿服务相关的高影响力教育实践。本研究通过控制服务学习、先前的志愿服务经验和留学选择偏差，提供了一些最明确的证据，证明留学是一种促进民主成果的教育经历。对于留学项目的提供者来说，这些结果表明，在回国后产生改善当地情况的愿望的方法可以进一步促进公民参与。从更大的范围来看，这些结果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人们对美国高等教育没有为学生争取民主公民身份做好充分准备的担忧，同时也让人们注意到，只有一小部分本科生参加了海外留学并得到这些益处。

3. 服务学习让美国学生参与有文化意识的内容创作和交互技术设计

作者: Matheson, B、Petersen, EJ
期刊: IEEE TRANSACTIONS ON PROFESSIONAL COMMUNICATION
出版时间: 2020.06
原文: Engaging US Students in Culturally Aware Content Creation and Interactive Technology Design Through Service Learning

随着技术和专业交流 (TPC) 的日益网络化, 学生必须学会跨文化工作。然而, 这些技能很难培养。我们报道了一个服务学习项目, 旨在帮助印度的学生为读者写作和设计。关于这个案例: 作者认为有必要向印度的从业者提供课程材料, 这成为让学生参与全球内容创作的机会。

本教学案例报告了两门课程的合作设计, 通过服务学习教授设计和沟通技能, 同时向印度TPC从业者提供课程内容。案例定位: 技术交流在全球化的工作场所教授写作技巧有着悠久的历史。服务性学习机会可以让学生跨文化参与, 同时鼓励他们批判性地思考受众意识。这个

案例通过报道学生如何学习跨文化和无障碍交流的原则来扩展文献。方法/方法: 本研究使用来自两门课程的定性学生反思文件来回答关于服务学习机会如何塑造学生技能的问题。他们的回答说明了课程设计的成功与失败, 并为从事类似项目的教师提供了策略。结果/讨论: 学生们报告说, 他们的经历有助于他们批判性地思考受众意识, 在协作中综合技能, 灵活运用新技术, 克服时间限制。结论: 我们为其他院校实施类似课程设计提供了切实可行的建议, 并提供了相关技术的实施信息, 证实在新的教学环境的适应力。

1.从承认到认同:高校社会实践育人体系创新研究

作者:孟勋、张凌媛

期刊:高教探索

出版时间:2020.02

原文链接:

<https://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code=CJFD&dbname=CJFDAUTO&filename=GJTA202005016&v=MDg3OTMzcVRyV00xRnJDVVI3cWZZT2R2RmlIaFVMM0pJaWZmYjdHNEhOSE1xbzIFWW9SOGVYMUx1eFITN0RoMVQ=>

摘要:社会实践是大学生了解国情民情、实现自我价值的基本方式,也是高校实践育人的重要方式。本文聚焦高校大学生在社会实践中的认知、行为和价值问题,结合承认理论详细分析了大学生在社会实践过程中的自我承认、他者承认和相互承认机制,并进一步提出从承认到共识再到认同的高校社会实践育人体系创新路径,即承认是逻辑起点,共识是行动基础,认同是价值实现。最后据此针对性提出“事前承认、事中共识、事后认同”三方面的原则性建议。

PART TWO

国内期刊

02

2.新公共管理理论视角下的日本私立大学社会服务的特征及借鉴

作者:麦均洪,黄海祺

期刊:黑龙江高教研究

出版时间:2020.05

原文链接:

<https://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code=CJFQ&dbname=CJFDAUTO&filename=HLJG202005017&v=MTAxOTBabUZDcm5VYnZCTFNIQmFiRzRITkhNcW85RVk0UjhIWDFMdXhZUZdEaDFUM3FUclDNMUZyQ1VSN3FmWU8=>

我国民办高校仍处于初步发展阶段,可借鉴在日本高等教育中占据重要地位的私立大学的成功经验。文章基于新公共管理理论视角研究了十所日本私立大学的社会服务,总结其特点,给我国民办高校发展提出四点启示:调整办学理念,倡导终身学习和奉献精神,做“思想的巨人”;搭建科学管理的社会服务平台,提高信息透明度和对大众的开放程度;因地制宜,加强与当地的联系;经营多形式的服务,增加创收,丰富传统的“以学养学”。

3.政治效能感、社会资本对大学生志愿服务的影响

作者：张冰、章晓懿

期刊：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出版时间：2020.05

原文链接：

[https://doi.org/10.13451/j.cnki.shanxi.univ\(phil.soc\).2020.03.017](https://doi.org/10.13451/j.cnki.shanxi.univ(phil.soc).2020.03.017)

基于上海四所高校678名大学生志愿服务参与程度的有效数据，构建了志愿服务影响因素结构模型，研究了政治效能感和社会资本作为自变量对大学生志愿服务的影响。在政治效能感对大学生志愿服务的正向影响中，社会资本表现出显著的中介效用，其中规范因素影响最大，性别、学历等变量具有显著调节作用；政治效能感(内部效能感、外部效能感)与大学生志愿服务参与的关联路径存在着正向关系，通过社会资本得到放大，直接和间接方式均可激发个体政治效能感，有效提升志愿服务的内生动力；社会资本对志愿服务持续性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构成社会资本的规范、网络和信任三个维度因子的回归分析结

均呈现显著影响，稳定的关系网络、良好的信任基础、规范建设可以促进大学生志愿服务。

行业动态

1.UP主发力，B站怎么带动年轻人做公益？

今年“世界读书日”，B站联合美丽中国策划了一场“读书等身”公益活动，邀请公众为乡村学校捐书，UP主们每发布一支“读书等身”话题视频，B站就为美丽中国项目学校的孩子捐出一本书，最后共捐出11697本。企业做公益如何结合自身特点？和公益组织又该如何合作？蜜得创益以“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做”的经典三问，对话B站市场中心总经理杨亮，从活动策划与执行聊到B站公益聚焦于教育领域，以及未来将结合B站作为一个开放的泛教育资源类平台的优势等愿景。

(转载自公益时报<https://hope.huanqiu.com/article/3ymiZXh2nmT>)

2.项目招募：助力公益慈善学历教育，“敦和·菡萏行动”二期招募启动！

经过菡萏一期的探索，其决定于2020年6月29日正式启动“敦和·菡萏行动”二期的项目招募，并将合作周期从1年调整为最长3年，以更合适的周期促进慈善教育在中国的演变，诚邀致力于探索/推动公益慈善学历教育发展的全国高校，加入“菡萏行动”。面向已经开办或有意愿新设立公益慈善相关的学位/专业/培养方向的院校（包括但不限于管理类、社会学类等），拟新合作3-5所院校，最高可获得50万元资助。2020年6月29日至8月31日期间高校可在线申报项目。

(转载自敦和基金会

<https://3g.163.com/news/article/FGBMVKVP052100BV.html>)

3.推动劳动育人，华东师大大夏书院成立公益实践基地

以公益实践为依托、推动劳动育人，华东师范大学大夏书院进行了有益探索。劳动报记者获悉，大夏书院日前揭牌成立公益实践基地，同时成立“紫江-大夏”公益社。今后将围绕公益实践活动，研讨依托于校内外合作的公益实践机制，充分挖掘公益实践中的育人元素，进一步深化“三全育人”工作。

(转载自劳动观察

<http://www.51ldb.com//shsldb/sz/content/017318de505fc0018fb2eff628e2c4a6.htm?from=timeline>)

4.友成基金会秘书长零慧:普及艺术教育,让乡村孩子美起来

美育是培养孩子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学校艺术教育是美育的主要途径。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于2015年起孵化支持的“益教室”乡村中小学艺术教育项目，通过培养学生的审美感受能力和审美表达能力，帮助学生树立完整、自信的人格。

近日，由北京新民社会组织能力建设促进中心指导，新浪公益联合推出的视频访谈节目《公益面对面》对友成基金会秘书长零慧作了专访。零慧秘书长以“益教室”为案例，畅谈了开展乡村学校艺术教育的意义、方法，介绍了友成基金会益教室项目普及艺术教育、促进教育公平领域取得的成果。

(转载自新浪公益<https://gongyi.sina.com.cn/gyzx/2019-06-24/doc-ihycitk7226926.shtml>)

5.上海宋庆龄基金会携手芬林集团和Safe Kids守护儿童健康

2020年6月27日，全球儿童安全组织(中国)(Safe Kids Worldwide)主办、芬林集团支持的“洁净小手，健康宝贝”公益项目，在上海世纪汇广场成功举办现场活动，活动在上海宋庆龄基金会家庭教育专项基金指导下进行。活动现场，芬林集团的6位员工志愿者和员工子女为孩子们表演了活泼有趣的小丑手指舞，还将“七部洗手法”创意地融入到手指舞蹈中，吸引了孩子们的强烈关注和模仿。活动现场，芬林集团的6位员工志愿者和员工子女为孩子们表演了活泼有趣的小丑手指舞，还将“七部洗手法”创意地融入到手指舞蹈中，吸引了孩子们的强烈关注和模仿。活动倡议在洗手后用纸巾擦干双手，杜绝二次污染。现场互动氛围热烈，参与洗手活动的小朋友获得了主办方赠送的纸巾盒与纸巾。活动也让家长和儿童了解洗手健康教育的意义，手护孩子的健康未来，也让更多人近距离感受和参与洗手公益的影响力。

(转载自中国财经网

<https://hope.huanqiu.com/article/3ysBhPSdAL1>)

紫江之声

黄晨熹：切实提高家庭应对公共卫生事件风险的能力

Q1：为什么需要提高家庭风险应对能力？

重大疫情面前充分发挥体制优势的同时不能忽略家庭应对风险能力的建设和发挥。此次疫情之重，对人们日常生活所造成的影响之深始料未及。自1月25日各省市相继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以来，居民主要是被动接受政府防疫措施的安排。我国体制优势再次凸显，社区居（村）委会在排查病患、提供必要的生活物品等具体服务中发挥重要作用。但这也正是问题所在，风险社会之下，家庭不应被看作社会治理被动式接受一方，不应将其置于幕后。如果家庭具备一定的风险应对能力，将是非常好的社会治理单元，相应地可降低对政府的依赖，减轻政府工作强度和成本。

家庭是最小的社会单位，是最重要的福利提供者，也应该是最重要的抗疫单元。社会福利的发展需要国家、市场和家庭共同承担。

Q2：家庭风险应对能力体现在哪些方面？

（一）理性看待风险

没有人可以提前预测危机何时到来，但一个普通家庭可以决定对待危机的态度，其中至关重要的一点是理性。首先我们并不缺少保持理性的机会。身处信息瞬息更新、便捷获取的时代，关注权威媒体的发声基本就能过滤更易牵动情绪的缺乏事实支撑的一派胡言。当然，鉴于此次疫情爆发之初将“吹哨人”的预警界定为“谣言”，不少人对官方言论保持质疑。但这种质疑本身何尝不是一种运用理性的能力，质疑也是对媒体监督。

（二）主动适应变化

力所能及，主动参与社区工作。疫情之初，社区居（村）委会、物业工作人员上门



黄晨熹

香港大学博士，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副院长、社会工作系和人口研究所教授、博导，全国社会工作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教育部社科基地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老年社会工作专委会副主任。

排查武汉返乡人员、发热病例、感染病例等，这是政府层面自上而下的必要任务。工作成效显著，但对工作人员人力及时间消耗极大。反之，当万千家庭具备主动上报、自我隔离的主动性，工作形式将产生反转，变成了居民自下而上的选择。居民具备一定的自治能力，这也是当前社会治理一直致力于追求的局面。此次疫情恰好是一个改变的契机，一方面要促使居民和村居委两方面都认识到相互合作的必要性，一方面要增加居民在应对突发事件时联系社区的主动性。

（三）良好的外部支持

家庭应对风险需要有外部正式和非正式的支持，尤其是家庭成员健康状况差、经济水平低、家庭成员居住距离远的家庭。面对突发事件带来的风险，国家、专业机构给予的经济、物质等方面的救助能有效缓解家庭风险。邻里、社区自组织等非正式团体，能有效弥补正式支持的不足，了解家庭在日常生活、心理情感等细微之处的需求，给予适当帮助。

Q3: 如何提高家庭风险应对能力?

家庭是社会工作服务的重要对象,包括改善家庭关系,提升家庭发展能力等。这次疫情表明,提升家庭应对公共卫生风险能力同样值得关系。家庭风险应对能力的提高不仅要从家庭入手,而且需要提供完善的社会服务与社会政策。后两者是家庭风险应对能力能切实发挥的基础与保障。

家庭层面,指导家庭制定家庭“应急预案”。每个家庭具体情况不同,应急预案具体内容无统一规制,但均可从三个方面入手:一是提高家庭主动认清突发事件本身及其可能带来负面影响的能力。在突发事前发生后,家庭成员应具备主动、理性的态度,依靠权威媒体发布,全面搜集信息,判断突发事件的性质及当前发展程度,并增强家庭内部沟通。二是提高家庭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面对突发事件,尤其是有老弱、病患人员的家庭,掌握必要的应对知识和方法很有必要,包括可获取资源、获取渠道、可求助机构等。三是付诸行动。以此次疫情为例,在封闭式管理过程中,针对家庭生活必须用品和服务的获得,激活正式和非正式社会支持网络。包括在疫情结束后,面对工作和生活上的变化,主动接纳、积极应对。

社会服务层面,对家庭应对能力进行分级,整合社会组织资源提供必要的服务。依托社区内楼组长、社区居委会人员、网格管理员等基层人员力量,从家庭人员健康情况、经济情况、外部支持等方面评估家庭应对突发事件能力,做出等级区分,形成档案,以此作为下一步服务工作展开的基础。以当地家庭综合服务中心、党群服务中心等社会组织为依托,整合家庭服务类社会组织。当面对突发事件时,能及时通过枢纽型社会组织的运作整合服务资源,优先

解决应对能力低、服务需求迫切家庭的需求。激活社区内居民自组织的潜力。相对于专业社会组织、社会团体,此类组织的优势在于熟悉社区,对居民具有可亲性。且规模小,运作灵活,成本低。在突发事件面前,该群体在互帮互组、为其他居民提供服务方面具有的显著作用。

社会政策层面,将家庭纳入必要的考虑维度。由于老龄化程度加深、儿童精细化养育压力增加、家庭结构小型化、人口流动等驱动因素,家庭照顾责任没有显著减少,但家庭的风险承担能力正在降低。家庭的回归,或者说提高家庭应对突发事件、应对不确定风险的能力,需要社会政策的支持。此次疫情将家庭推到了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的前面,疫情的控制需要每个家庭为之负责。但此前,在社会治理中家庭作为一个单元并未得到足够的重视,社会政策中系统的家庭政策还较缺乏。在尊重当前社会发展事实及家庭的传统地位两者之下,不破坏家庭的独立性,系统考虑家庭政策的发展,提高家庭的应对能力,形成国家、市场、家庭三者平衡的状态。

周俊：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多元化的制度成因分析

党的十八大提出要“加快形成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这对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以下简称“政会关系”）提出了新要求。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政府对社会组织空间无所不在的穿透和无所不能的控制已经不复存在，政会关系大为改观但是社会组织仍因身份、业务主管单位、功能等差异而受到政府的区分对待，与政府结成了非常复杂的关系形态。

学界常用法团主义、多元主义等理论解释一国政会关系的特征，然而，由于现实的复杂性，在何种理论能够解释我国政会关系特征的问题上一直存在争议。有学者认为，中国政府直接或间接地创建了大量社会组织这些组织承担了许多政府职能是国家制度的一部分，因此，中国的政会关系具有法团主义特征。但多元主义的赞同者却认为，中国的政治精英并没有清晰的构建法团主义的努力，不断获得独立性的社会组织已经成为一种外在于国家的力量，多元主义的政会关系正在形成之中。多元主义和法团主义都在现实中找到了大量例证，在长期的论争中难分伯仲。有学者试图调和它们的分歧，提出两种理论可以相互补充着解释现实，但也有学者指出，这两种理论都不具有中国适用性中国的政会关系仍然是威权主义的，因为绝大多数社会组织不具有相对于政府的独立性政府不是放松了对社会组织的控制，而是将直接控制转变为了间接控制。

正如不能用简单的模式理解纷繁复杂的中国政治试图以任何一种理论解释我国政会关系的特征也必然面临困难，每一种理论捕捉到的都是政会关系的局部特征，只有将多种理论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才能看到较为完整的政会关系图景。必须以多种理论共同加以解释，实际上反映了政会关系现实的多元性，也就是说，在同一时期的不同情境中，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关系存在差异，本文称政会关系的这种现实差异性为“政会关系多元化”。基于这一判断，



周俊

华东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华东师范大学社会组织与社会治理创新研究中心主任，浙江大学社会治理研究院、浙江省商会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德国基尔大学、美国印第安纳大学访问学者。

追问我国为何没有像英美等国家一样形成相对稳定和单一的政会关系模式，而是存在多种政会关系形态，便成为非常有意义的问题。对此学界已有一些相关研究，但这些研究大多是基于利益的视角做出的，忽视了制度在塑造政会关系中的重要作用，有鉴于此，本文拟在批判性地回顾既有研究的基础上，从制度的角度讨论政会关系多元化的形成原因，并对政会关系的制度化建设提出建议。

制度供给不足和多种制度并存是政会关系多元化基本格局形成的重要原因，而政府在制度框架内的自主选择则进一步加深了政会关系具体形态的差异。可以说，在既定的制度安排中，政府和社会组织的行动空间主要是由制度决定的多元化的政会关系是一种制度产出而非基于利益的权宜性安排。得出这一结论，除意在弥补利益视角的研究忽视了制度的重要性这一不足之外，更旨在为改善政会关系提供建设

性意见。在某种意义上政会关系多元化不仅是一个事实判断，它还表征了政会关系整体秩序的缺失，因为与多种形态并存的政会关系相伴随的是社会组织在登记注册、政府扶持、与政府合作、政策参与等方面的机会不平等和差别性待遇，社会组织内部的分裂和相互抵制等不良现象。因此虽并不必然要求政会关系整齐划一，但改善现有制度中的不足合理规范政府行为，保障社会组织的平等权利，是建立新型政会关系的应有之义。事实上，政会关系改革的序幕已经被拉开。正如前文提到的，直接登记制度的实施解构了饱受争议的双重管理制度，监管制度的全面重建指日可待；税收优惠政策日益完善，社会组织的受惠面不断扩大；以政府购买服务为主要形式的政会合作正在被大力推进，越来越多的社会组织获得了参与公共治理的机会；随着公益诉讼主体地位的确定社会组织政策参与的制度化途径也在增多。这些变革释放出的信号鼓舞人心，然而，政会关系的制度化建设总体上还处于初步启动时期，全面而深入的变革仍有待做出。有鉴于此，本文就加强政会关系的制度化建设提出几点建议：

首先，明确政会关系制度化建设的目标。加强制度化建设是改善政会关系中的制度不足和制度多样性的根本途径。然而，“制度化并不必然是一个好的目标”。如果与理想原则有距离、受特定利益控制，制度化的结果比没有制度更加糟糕。这意味着，政会关系的制度化应始终坚持正确的方向。我国对政会关系模式一直缺乏顶层设计，政会关系的发展方向不甚明了，这种情况不利于政会关系的有序发展亟待改变。但我们也不能因此仓促地“拿来”多元主义、法团主义或任何一种主义，而要基于我国政会关系的历史传统与现实情况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探寻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政会关系模式。值得指出的是在政会关系制度化目标的形成过程中，应充分尊重社会组织的意见。鉴于社会组织一直缺乏影响高层决策的制度化途径，本文建议在各级党代会和人代会上增加

社会组织代表的数量，在各级政协中设立社会组织届别，以保障社会组织话语权。

其次，加强政会关系法制建设。有明确目标指向的政会关系法制建设至少应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加强立法，二是加强对现有法律法规的清理。在立法工作中应尽快制定出台社会组织基本法，改变社会组织管理缺乏法律依据的问题。社会组织基本法应基于平等、公正的原则对政会关系做出全面部署对监管、扶持、政会合作、社会组织政策参与等问题做出原则性规定。以社会组织基本法为依据，相关管理部门应对政会关系的具体领域制定行政法规、行政规章等规范性文件，并做好各文件间的衔接和匹配工作。在法律法规的清理工作中，应尽快修改相互矛盾和冲突的、不适应新形势和表述模糊的内容。比如，改变关于社会组织营利行为的冲突性规定，将政府购买服务纳入《政府采购法》等。无论是立法还是法律法规清理，都应特别重视对行政自由裁量权的规范设定合理的自由裁量幅度和范围，尽可能减少政府偏离或背离法律授权的目的而滥用自由裁量权的机会。最后，建立政会关系监督机制。制度能否发挥作用还取决于它的实际执行情况，因此，在政会关系制度化建设中，需特别重视建立健全监督机制。为此一方面，需要加强信息公开工作，不仅要公布与政会关系相关的制度，还要公开行政裁量的具体执行标准，以及公示行政和执法结果要通过全方位的信息公开将政会关系置于阳光之下。另一方面，需要加强投诉处理机制的建设使来自监督者的意见得到及时有效的处理。由于与政会关系相关的投诉可能会涉及政府自身的利益，因此，建议设立独立于政府的投诉处理机构，以保证其工作的独立性和公正性。需要指出的是，基于对利益视角研究的反思，强调制度在塑造政会关系多元化中的重要作用，提出应加强政会关系的制度化建设仅是政会关系制度化研究的一个开端更多更深入的研究还有待做出于各界的共同努力。

紫江大事记

6.3 “紫江·善知公益讲堂”第一季第一讲：重新认识志愿者

6.9 紫江公益学园“善讲堂”第三讲：企业社会责任与经济效益

6.13 “紫夏公益社”公益先导课：公益的远方，有多远

6.17 “紫江·善知公益讲堂”第一季第二讲：做公益是我的第四个梦想

6.19 大夏书院公益实践基地揭牌暨“紫江·大夏”公益社成立仪式

6.24 紫江·善知公益讲堂|第一季第三讲：公益事业如何可持续化运营

顾问：陈琳、黄晨熹、周俊、栗蕊蕊、章晶晶

统筹：李欣阅

总编辑：文若澜

编辑：文若澜（研究前沿）、练金晶（行业动态）、程钟悦

（紫江之声、紫江大事记）